

UN AMOUR DE SWANN 司旺的爱情

【法国情爱小说经典】

(法) 左拉、普鲁斯特等著

经典文库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UN AMOUR
DE SWANN
司旺的爱情

【法国情爱小说经典】

（法）左拉、普鲁斯特等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旺的爱情——法国情爱小说经典/[法]左拉
(Zola, E.)等著;王振孙等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80681-524-4

I. 为... II. ①左... ②王... III. 中篇小说-
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452 号

司旺的爱情——法国情爱小说经典

作 者:左 拉等

译 者:王振孙等

责任编辑:余 同

封面设计:陈 楠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9

插 页:2

字 数:205 千字

版 次:2004 年 9 月新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524-4/I·089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	魔鬼附身	雷蒙·拉迪盖
96	为了一夜的爱	左 拉
133	柔和的眼睛	弗·萨冈
147	司旺的爱情	马塞尔·普鲁斯特
201	蓝眼睛黑头发	玛格丽特·杜拉斯

魔鬼附身

雷蒙·拉迪盖

我将要受到责备。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我才满十二岁，难道这也是我的过错？这个非常时期在我身上引起的骚乱，绝不是这样年纪的人所能体验的；然而，表面现象归表面现象，那种足以使我们变得老成的东西终究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作为孩子经历了成年人不免也感到棘手的奇遇。有这种经历的人不止我一个。我的同伴们对于这个时期的回忆就不同于他们的长辈。请那些责怪我的人想想战争对那么多的男孩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那简直是长达四年的假期。

我们住在马恩河边的F镇。

我的父母亲对于男女生之间的情谊宁可说是持反对态度。与生俱来的情欲一向是盲目的，在男女合校的情况下当然不会消失，反而是如鱼得水。

我从来不是爱幻想的人。对那些轻信的人来说是梦幻，对于我则如同猫见到干酪那样千真万确，尽管干酪上面罩着玻璃罩。玻璃罩确实是存在的。

玻璃罩打破了，猫趁机吃了干酪，哪管玻璃罩是不是它的主人打破的，还划破了手。

直到十二岁,我不曾有过任何轻浮之举;只有一次,我派一个比我小的男孩给一个名叫卡尔曼的小姐传送一封信。信中表达了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我以爱情的名义约她相会。信在早晨她进教室之前交给了她。这是唯一与我相像的女孩,因为她模样长得光洁,和她妹妹相伴去学校,就像我总有弟弟陪着我一样。为了堵住这两个知情人的嘴,我设想把他们两个也结合在一起。我同时替我还会不会写字的弟弟起草了一封致福韦特小姐的信。我对弟弟说明了我的撮合,以及我们交的好运,恰巧遇到这样两个和我们年龄相仿、取的名字又如此不同凡响的姐妹。我的父母是溺爱我的,从来不骂我,我和他们一起用过午餐后,就去学校上学。这时,我伤心地发现卡尔曼确实正派美好,我并没有估计错。

当同学们一一在课桌前坐好,而我作为班上的顶儿尖儿,正蹲在教室后头,从壁橱里取朗读课本时,校长进来了。学生们起立。校长手里拿着一封信。我的腿一阵发软,书掉在地上了。我正在拾起那几本书,校长和老师在那里说了些什么。坐在前几排的同学这时都回过头来朝我看,因为他们听见轻声谈话中提到我的名字。我在教室后头,满脸通红。校长终于叫了我的名字,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巧妙地惩戒我一番,不致引起学生们的什么不好的想法,他祝贺我写了一封十二行的信而没有半点错误。他问我信是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他要求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们根本没有去办公室。就在院子里,在大雨倾盆之下,我挨了他一顿训斥。破坏一个姑娘的名誉(是她的父母把我的那封信交给他的),又偷了一张信纸,他认为这两件事性质同样严重,这可深深地搅乱了我的道德观念。他威胁我说要把那封信送到我的家里去。我恳求他不要这么做。他让步了,但又说信由他保存,我若

稍有不轨,再犯错误,我的坏行为他就决不再隐瞒了。

这种放肆加羞怯使我家里的人不明真相,我竟骗过了他们;好似在学校,我的“小聪明”——实际上是懒惰——竟使我成了一个好学生。

我回到教室去上课。老师讥讽地叫我唐·璜。对此我感到极为光荣,因为他道出了我所熟悉而我的同学无所知的那部作品的名字。他的“你好,唐·璜”以及我会意的微笑,使得整个教室都对我十分注目。也许班上已经知道我托一个低年级的孩子捎信给一个“女的”,如同小学生粗野的说法那样。这个小孩名字就叫“信使”吧;我可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才选中他,不过,这个名字毕竟使我产生了信任感。

中午一点钟,我找到校长请求他不要将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到了下午四点钟,我又急不可耐地向父亲都讲出来了。谁也没有逼迫我。我认为我这个招供是出于我的诚实。确信父亲不会生气,我很高兴让他了解了我的这一次壮举。

所以,我坦白了,还得意地补充说:校长答应我守口如瓶(就像对一个大人作出许诺一般)。父亲很想弄清楚这段艳史是否纯系我的杜撰。他于是专程前来会见校长。在会见过程中,他附带提及此事,并表示他认为这不过是一次恶作剧罢了。“什么?”校长十分诧异,而且窘迫,“他把这件事告诉您了?他要求我瞒着不要告诉您,他还说您会杀了他呢。”

校长以这句谎言为自己开脱。这越发令我沾沾自喜。我当场就赢得了同学们的敬意,老师也眯起眼睛向我投来眼风。校长只好暗中发恨。这个倒霉的人对于我已知道的事还蒙在鼓里:我父亲对他的言行很是不满,决定等我这一学年结束后就要我退学。当时正是六月初,母亲不想影响我得奖和受表扬,把事情留

到发奖之后再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由于校长暗自担心他的谎言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全靠校长不公正的决定,我成了班上唯一获得金冠奖的学生,而优秀奖按理也是可以得到金冠奖的。这一着是失算了:学校失去了两名优秀生,因为,优秀奖获得者的父亲让他的儿子退学了。

像我们这一类学生原是学校打出来的招牌,是利用我们招徕其他学生的。

母亲认为我还小,进亨利四世中学不相宜,在她想来,进亨利四世中学意味着:要乘火车上学。所以我有两年时间待在家中自学。

这一来我可真是快乐极了,因为,我的那些同学两天做不完的功课,我用四个小时就可以做完,所以每天有一大半时间由我自由支配。我独自在马恩河边漫步。这条马恩河我们是这样熟悉,我的妹妹竟把塞纳河也说成是“一条马恩河”。我甚至不顾父亲的禁令,坐上他的船划出去。不过,我并没有划船到河里去玩,我只是不愿意承认我怕的是不服从父命,反正害怕就是了。我躺在船舱里看书。在一九一三和一九一四这两年间,我在那里读完了两百本书。那绝不是人们称为坏书的那一类书,而是最好的书,如果说对思想来说不算最好,至少从价值上看是最好的。因此,许久之后,到了对儿童读物不屑一顾的少年时代,我却对那魅人的稚气发生了兴趣,可是在当时,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读那种书的。

这种娱乐与学习相互交替也有它的弊病:整整一年对我来说变成了伪造出来的假期。这样,我每天的功课都只是一点点,但是,由于平时学习的时间比别的孩子少,他们放假我却需要继续

学习。这种功课只学一点无形中便成了一辈子拴在猫尾巴上的软木塞甩也甩不掉^①,可是这猫宁肯在尾巴上拴上一口锅,最好只拴一个月。

真正的假期临近了,我却全不在意,因为对我来说,生活照旧是老一套。猫可是一直在盯着扣在玻璃罩下的奶酪的。战争爆发了。战争打碎了那个玻璃罩,主人忙着去打别的猫,这只猫高兴极了。

说实话,在法国,每个人都各有其乐。孩子们夹着他们的奖状,拥挤在布告栏前。那些坏学生因为家里为战争惊恐慌乱也有有机可乘。

每日晚饭后,我们都到离家两公里远的J站去,看军用列车通过。我们带去风铃车,抛给士兵们。穿着工作服的太太们往军用水壶中倾注红葡萄酒,在铺满鲜花的站台上洒洒得地上都是。这一切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节日焰火一样。还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酒白白糟蹋掉,有这么多的鲜花任其凋零枯萎,还不如用来装饰我们家的窗户呢。

没有多久,我们不再去J站了。弟弟和妹妹开始抱怨战争,他们觉得打仗打得太长了。因为战争他们到海滨度假被剥夺了。他们已经养成睡懒觉的习惯,可是现在必须六点钟起来去卖报纸。真是可怜的消遣!不过,八月二十日左右,这些小鬼又满怀希望了。大人们吃罢饭,迟迟不肯离开饭桌,小鬼们也赖着不走,好听听父亲议论出外旅行的事。显然,当时找不到交通工具,必须骑自行车远途跋涉。小妹妹的自行车轮子的直径只有四十厘

① 一种儿童游戏,把一条小木棒拴在猫尾巴上,让猫拖着木棒到处跑。

米,弟弟们取笑她说:“把你一个人丢在路上了。”妹妹哭了起来。可是你看,他们一个个擦车的劲头有多大!没有人偷懒。他们是提议帮我修车子。他们天一亮就起来出去打听消息。人人都惊异不止。我发现爱国的动机,原来是骑自行车出去旅行。到海边去!并且比我们往常去的海更远、更美丽。为了早走,放火烧掉巴黎他们也做得出。使整个欧洲震惊的事件,倒成了孩子们唯一的希望。

孩子们的自私心难道和我们的自私心竟是这么不同?夏天,在乡下,我们诅咒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而农民却祈求降雨。

动乱发生而没有先兆,那是罕见的。刺杀奥国皇太子,还有卡约案^①引起的风暴,扩散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使荒唐成为可能。同样,我对于战争的真正的回忆也先于战争本身。

事情是这样的:

弟弟和我嘲笑我们的一个邻居,此人滑稽可笑,五短身材,留着一撮花白的短胡子茬,头上总是戴着风帽。他是市镇参政员,名叫马雷索。虽说是紧邻,我们却从来不和他打招呼,这让他怒不可遏。一天,在路上,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向我们走过来,说道:“你们不向市镇参政员问好,嗯?”我们拔腿就跑。这一次的无礼导致我们之间的仇恨公开化。不过,一个市镇参政员岂能奈何我们?上学或放学回家,弟弟都要拉他的门铃,胆子有增无减,因为他那条狗按年纪看与我不相上下,没什么可怕的。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前夕,我去接我弟弟,在路上,我看到

① 卡约(1863—1944):曾任法国财政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的征收所得税的政策以及反战态度受到《费加罗报》的激烈攻击。他的妻子谋杀了《费加罗报》社经理,他本人被迫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在马雷索家的铁栅栏前，聚集着许多人，使我大为惊讶。几株修剪过的椴花树遮不住园子尽头的别墅。从下午两点钟起，他们年轻的女佣发了狂，躲在屋顶上，不肯下来。这种丑事使得马雷索夫妇惊慌失措，他们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整幢房子仿佛无人居住，这更给屋顶上的疯女人增添了一层悲剧色彩。人群吵吵嚷嚷，对于主人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救助这个不幸的女子而愤愤然。她在屋顶的瓦片上摇来晃去，当然不是那种喝了酒的醉醺醺的模样。我本想再看下去，可是我们家的女佣人受母亲差遣来催促我们回去做功课。否则，就不让我过节。我无精打采只好走了，同时乞求上帝让疯女人长留在屋顶上，直到我去车站接我的父亲。

她仍然留在那地方没有下来。不过，从巴黎回来的行人寥寥无几，都急于回家吃饭，以免误了舞会，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她就过去了。

再说，那情况，对那个女人来说，也不过是进行一次稍稍公开的排练罢了。她要到晚上才正式登台表演，明亮的烛光将是她名副其实脚灯。马路上，花园中，不乏灯烛火光，马雷索作为名流，即便假装不在家，也不敢连灯光照明都取消不用。在屋顶上，如同一艘挂满彩旗的船只的甲板，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来回走动，她那非人的、喉音很重、温柔得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声音使这座罪孽深重的住宅显得荒诞离奇，神秘莫测。

小城镇的消防队员本来都是“志愿者”，他们成天忙于别的事，无暇顾及消防水泵。这些奶制品商人、糕点师傅、修锁匠作为救火队员，只好等他们做完活之后才肯来救火，假若火灾不是自生自灭的话。自从战争动员开始，我们的消防队员就身兼二职，成为某种神秘的民兵，他们还要巡逻、操练、查夜。这些好汉终于

分开了拥挤在一起的人群，来到现场了。

一个女人走上前去。这是一位市镇参政员，马雷索的政敌的夫人，她早就在那儿咋咋呼呼，表白她对疯女人的怜悯了。她叮嘱消防队长道：“尽量用温情好意开导：可怜的姑娘，她太需要温情了，这一家人总是打她。如果她担心被解雇和找不到事做才这么干的话，那么你就告诉她，我可以雇她。我给她双倍的工钱。”

这种张扬的善举在人群中收效甚微，这位太太令人讨厌。人们感兴趣的是把人捉起来。消防队员共有六人，他们爬上铁栅栏，包围了房子，从各个方面往屋顶上爬。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刚露出屋顶，人群就像看木偶戏的小孩一样，高声叫喊，提醒屋顶上的那个受害者。

“你们不要出声！”那位太太喊道。围观人群于是“又上去一个！又上去一个！”的喊声有增无减。听见喊声，疯女人以瓦片为武器，朝第一个爬上屋脊的消防队员的头盔扔去，击中了目标，其余五个立即撤了下来。

打靶场、骑马场、游戏棚、市政广场一向哀叹顾客稀少，可是这天夜里，收入应该是可观的了，胆子最大的几个二流子居然爬上墙头，拥挤在草坪上观看追捕女疯子。那个女疯子说的话我已经忘记，只记得她那种悲切又认命的声调，她是对的，所有的人都错了，正是这样的信念才使她发出那样的悲声。这一场戏比闹市更吸引着那几个小阿飞，不过，他们又想兼顾其他娱乐。于是，怕疯子在他们离开期间被带走，他们飞跑着去骑了一会儿木马。另外几个人要理智些，就坐在椴树的杈丫上，好比是看凡赛纳的阅兵式，燃放一些焰火和鞭炮也就满足了。

马雷索夫妇关在家里，处在嘈杂声和火光的包围之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不难想象。

市参政员,那位善心的太太的丈夫,爬到装有铁栅栏的矮墙上,即席发表演说,揭露房主人的卑怯行为。人们为之热烈鼓掌。

疯子以为人们在给她喝彩,向众人行礼,两个胳膊下面各夹着一叠瓦片,每当有消防帽闪动,她就扔出一块。她用她那非人的声音感谢人们终于理解了她。她让我想起一个姑娘,海盗船的女船长,孤身一人站在她的船上沉下海去。

人群散去,他们有点厌倦了。我母亲为了不让孩子们恶心,先让他们吃点东西,好带他们从骑马场转到滑车道去玩,我和我父亲没有去,留了下来。我当然比弟弟们更强烈地想去玩滑车道。我喜欢让我的心跳得快,让心脏乱跳一阵。但是眼前的景象,却更富有诗意,更能让我感到满足。“你脸色多么苍白!”刚才母亲就这样说过。我借口说焰火好看,它让我看什么东西都是绿盈盈的。我想留在这里看下去。

“我还是担心这场面给他刺激太深,”她对父亲这样说。

“嗨,”父亲回答道,“没有人比他更无动于衷的了。他什么都可以看,除了给兔子剥皮。”

父亲这样说是为了让我留下。但是他也明白,眼前这情景震荡着我的心。我感到他也在受到震动。我要求他让我骑到他的肩上,好看得更清楚一些。实际上,我快要晕倒了,我的两腿已经支持不住了。

现在只剩下二十来个人了。我们听见吹号声。消防队员们手举着火把准备撤走。

上百个火把突然照得疯女人清清楚楚,仿佛在柔和的脚灯之后,一下又亮起了镁光灯,正在为一位新明星拍照。因此,她挥动着双手,表示告别,甚至她以为世界末日到了,或者是有人要抓住她,她纵身一跃,从房顶上往下跳,压塌了遮阳罩棚,发出了吓人

的撞击声，摔到石阶上。直到此时，我一直尽力忍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尽管我的耳朵轰鸣，提心吊胆。当我听到有人喊出“她还活着”时，我从父亲的肩膀上一头跌了下来，失去了知觉。

醒来以后，父亲把我拖到马恩河边。我们躺在草地上，默默无言，一直呆到很晚。

回家的路上，我仿佛看到栅栏后面那个女佣人苍白的的身影——女佣人的幽灵！原来那是马雷索老爹戴着白帽子，在巡视损坏的东西，他的凉棚，瓦片，草坪，灌木丛，血迹斑斑的石阶，还有他已经毁去的声名。

我所以详细叙述这一段经历，是因为它比任何别的事情更能说明战争这种奇怪的现象，还有，事件所具有的诗意远比它的那种外表别致引人更能震撼我的心。

我们已经听到了炮声，战争在汉城附近进行。人们谈论说，在距我家十五公里的拉尼附近俘虏了枪骑兵^①。姑妈说她有一个女友，从最初几天开始就把挂钟，沙丁鱼罐头之类埋在花园地下，然后逃走。我问父亲用什么办法可以将书带走，我最不能割舍的就是这些书。

正当我们准备逃难时，报纸上的消息告诉我们，逃走已经无济于事。

现在，我妹妹她经常到J镇去给伤员送梨。她发现这件事对于她已告破产的美好的计划是一种补偿，微不足道那是当然的。每当她们一到J镇，篮子几乎总是送了个空！

^① 指普鲁士枪骑兵。

我本来应该是进亨利四世中学的；可是父亲宁可让我在乡下再呆一年。在这个沉闷的冬天，我唯一的消遣就是到卖报的商贩那里买一份《词语》周刊，这是我喜欢刊物，星期六出版。每逢这一天，我从来不睡懒觉。

可是不久春天又到了，我的稍稍越轨的行为使这个季节显得轻松愉快。我借口出去募捐，我不止一次，身上穿着星期天整齐的服装，和一个女孩一路同行，我拎着捐款箱，她拿着徽章篮子。自第二次出去募捐开始，伙伴们就教我利用这些自由自在的日子，和一个小女孩要好起来。从此以后，我们抓紧上午的时间募到尽可能多的款额，中午将它交给管事的太太，然后我们就到谢内维耶尔山丘胡乱去玩了。我第一次有了一个朋友。我喜欢和他的妹妹一起出去募捐。这也是第一次，我和一个男孩谈得如此投机，他和我一样是早熟的，我甚至非常欣赏他俊美的容貌，还有他的那种不知廉耻。我们对和我们的同龄人都看不上眼，这也使我们更加亲近。我们认为对许多事情只有我们才懂，所以也只有我们才配得上和女人来往。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是真正的男人，是男子汉了。天缘凑巧，我们是不会分手的，勒内已经进了亨利四世中学念书，我呢，我也要分到他的班上，上二年级。他本来不学希腊语，竟为我作出极大的牺牲，说服他的父母，让他上这门课。这样，我们以后就经常见面。由于他没学过希腊语，必须增加个别补习课。一年前，因为勒内再三央求，勒内的父母才答应他不去学希腊文。所以，现在勒内又要学希腊语，弄得他们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是受到我的好影响才会是这样；如果说勒内的其他的同学他们可以容忍的话，那么我至少可说是他们唯一深加赞许的朋友。

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一年假期没有一天让我觉得是气

闷难挨的。我知道任何人都逃不过他的年龄,一旦有人以适合于我的方式用心关注我,我的那种危险的鄙视一切的态度就立刻像冰块一样融解了。我们两人都很主动,因此我们各自的骄傲需逾越的途程也就缩短了一半。

开学那一天,勒内成了我的难得的向导。

和他在一起,一切都变得无比愉快。我孤身一个人我是一步也不想走的,如今,从亨利四世中学到我们乘火车的巴士底东站这一段路程,我们一天来回要两次。

三年就这样过去了,既没有和别的人建立友情,也没有其他的希望,除了每个星期四^①和女孩子们厮混,她们是我的朋友的父母天真地为我们提供的:他们同时邀请儿子与女儿的朋友到家里来用下午点心;她们和我们又借口说游戏,互相暗中取得一些微微的爱抚。

在美好宜人的季节里,父亲喜欢带着我和弟弟去郊游。我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奥尔梅松,我们沿着一米宽的莫尔布拉河往前走,这条小河从草原上流过,草原上百花吐艳,这里有些花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它们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长满了水田介或薄荷丛遮蔽着的水道,走在这里摸索路径,失足落水是防不胜防的。春天,河中水流带走数也数不尽白色和粉红色的花瓣。那是山楂花飘落的花瓣。

一九一七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同往常一样,我们乘火车到拉瓦雷纳去,从那儿我们再步行到奥尔梅松。父亲对我说,我们

^① 星期四中学不上课。

在拉瓦雷纳要见到一些讨人喜欢的人,那就是格朗杰一家人。我知道他们,我曾经在一次绘画展览的目录上看到他们的女儿玛尔特的名字。记得有一天,我听到父母亲说有一位格朗杰先生来访。他来了,手里拎着一个纸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他十八岁的女儿玛尔特的作品。那时玛尔特病了。她父亲想让她出其不意地高兴一下,让她的水彩画在我母亲主持的慈善机构主办的展览会上展出。这些水彩画本身平平并没有什么特色,只是叫人想到图画课上的好学生,伸出舌头,舔着画笔。

格朗杰夫妇那天在拉瓦雷纳车站月台上迎候我们。格朗杰夫妇大约年岁相仿,都是五十岁上下。不过,格朗杰太太显得比她丈夫年长,她的举止显得有些粗俗,身材矮小,我第一次看她就不喜欢。

在散步的时候,我发现她不时紧锁双眉,这使她额上布满了皱纹,皱折之深要一分钟才能消失。我有种种理由讨厌她而不至于责备自己不公平,为此,我真希望她的谈吐普普通通,随和一些。在这一点上,她让我感到失望。

她的丈夫倒像个老好人,他从前是下级军官,受到士兵们的爱戴。然而怎么不见玛尔特?想到我们可能只是在她父母陪伴下散步,我不禁感到发抖。格朗杰太太解释说:玛尔特因为没有及时准备好,将和弟弟一道乘下一趟车来,一刻钟以后到。

火车进站了。玛尔特站在车厢的踏板上。

“等火车停稳!”她母亲向她喊道。

这个冒失的女孩子让我产生了好感。

她的裙子、帽子都很朴素,表明她对于陌生人的评论不大在意。她拉着一个小男孩,看样子有十一岁。这就是她的弟弟,他脸色苍白,有着白化病患者那样的头发,一举一动都透出病态。